

20 世纪 60 年代新中国 留苏教育研究*

李 鹏

[内容提要] 新中国早期留学生派遣工作和中苏关系密切相关。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留学生派遣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留学生的身份也从友谊的“使者”转变为“反修防修的战士”。随着新中国留苏学生派遣工作战略部署的及时调整,学生数量急剧减少,派遣的专业也十分有限,事实上这标志着历时近 15 年的新中国留苏教育高潮的终结。

[关键词] 中苏关系 留苏教育 留学政策 反修防修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02-0190-09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2.027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关系在经历了短期的试探后,逐步走上了结盟的道路。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初步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新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赴苏学习,希望能通过留学之路,建设新中国的人才队伍,快速实现新中国的现代化。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60 年代留苏学生的身份逐步从中苏友谊的“使者”转变为“反修防修的战士”。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越来越需要担负起“反修防修”的“重任”,并逐步成为战斗在国际“反修防修”阵地第一线的“战士”。

一、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1960 年上半年,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4 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三篇文章:红旗杂志社刊发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刊发的《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

进》以及由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所作的《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这些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度。随后的 6 月初,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大会上暴露于世。6 月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遭到了苏联代表团的围攻和指责。7 月 16 日,苏共中央全会正式宣布召回在中国的近 1400 名苏联专家,单方面废除 343 个专家合同和 247 个科技合同。此决定当天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正式通知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撤回专家、废除合约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 40 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 多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陷入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中苏关系也陷入破裂的边缘。

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虽然经历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留苏教育研究(1949—1966)”(项目编号:14BZS089)的阶段性成果。

短暂的缓和,但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后,双方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共扣上了“反列宁主义的行为”、“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的帽子。同年4—5月间,在苏联驻乌鲁木齐、伊犁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地区的六万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5月,苏联还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而且,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上又继续表现出偏袒印度的立场。1962年冬,苏共领导人又利用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机会,组织一些代表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甚至亲自攻击中国。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社论文章进行反击。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七篇文章,中苏开始公开论战。这时,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其信中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公开信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指责,并把两党产生分歧的责任全都推给中共。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公开与中共论战。随后,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的十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阵地,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1965年中共答复苏共,不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两国联盟关系名存实亡。

客观地看,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从结盟到蜜月期的阶段,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与此同时,留苏教育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截止到1958年底,新中国派遣留苏学生人数共计7493人,其中教育部系统派遣7095人,科学院系统派遣398人。从年份上看,1951—1953年派出1178

人,1954—1956年派出人数最为集中,达到6445人。^①当时对留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国际主义精神和正确认识国内运动。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中国方面对加强留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的基本认识是,“要培养他们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观点,防止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也要培养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要防止不照顾国外特点,不尊重所在国的管理,自己单搞一套……对于所在国所实行的重要制度,例如研究生制度,不要轻易提出改变。因为这是两国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慎重。”^②可以说,在1960年前,对于留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处理中苏关系的问题,中方还是秉承客观、自省的态度,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有错就改。

二、第二次全国留学生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留学政策的转向

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1960年9月13日至21日,国家科技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和外交部党组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召开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反修正主义斗争”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发表后的国际政治新形势,会议对今后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和留学生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确定了今后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和留学生管理的一些新规定。

(一) 确定新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的发奋图强、增强信心、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精神,本着积极而慎重的态度”留学生派遣“采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方针”^③其中“提高质量”的主要标准是严格政治审查。留学生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不仅要家庭出身成分好、政治历史清楚、社会关系没有问题,而且必须政治思想觉悟高,作风正派,业务条件、外文水平和身体条件都要符合出国要求,宁少毋滥,不要勉强凑数。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当时留学生管理处曾专门就留苏学生殷承宗的学习问题向文化部发文商榷,汇报该生在业务上、思想上确有不少进步,但政治上比较幼稚,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都不够敏锐和清楚,还有些骄傲自满情绪。对于其是否返回苏联继续学习的问题,希望文化部加以研究。^④关于派遣人数上“宁少勿滥”的规

定,执行得也是非常严格。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批复当年派遣留学生问题时指出,“凡不合要求的一律不派;合乎要求而我们国内学校已能解决的,也不派;研究生非十分必需外,应在生产和工作中已经表现出成绩的人才中选派。如因此而不能满足50个名额就不派。总之,只许少派,不许超过。”^⑤从实际情况看,60年代留苏学生派遣数量急剧下降。1961年派遣74人,1962年55人,1963年17人,1964年仅有3人。^⑥

(二) 在留学身份和派遣专业方面进行严格限定

这个时期的留苏学生主体已不是大学生,而是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留学年限也大大缩短,所学专业也多是语言翻译或非重点行业。当时规定,“一般选择国内急需的而对方特长又能接受的专业进行派遣,但同时表示绝不存在依赖思想,如果对方不接受,就不勉强。考虑到社会科学专业如哲学、经济和法律等专业的留学生在苏联学习会遇到不少问题,建议尽量不派。如果需要学习对方国家的历史、语言文学等专业,可以派遣适当具有较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俄文水平的进修教师和进修生。体育艺术类一般不派。”^⑦1961年,教育部选派留苏学生计划为111人,其中研究生36人,进修教师55人,大学生20人。这些留学生中理科31人,工科40人,农科6人,林科1人,医科5人,文科2人,艺术3人,体育3人。而在20名大学生中,学习原子能方面的就有19人。考虑到当时苏方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学习机密专业有所限制,教育部建议“将机密专业主动向苏方交待清楚,最后苏方能接受多少,我们就派多少,不能接受的也不勉强”^⑧。在实际执行中,1961—1965年间共计派遣的留苏学生中研究生和进修教师184人,占同期全部留苏学生的92%。^⑨

(三) 加强留学生“反修防修”政治思想教育

会议规定,要大力加强留学生四个方面的思想教育:首先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教育,认真学习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三篇文章,使留学生明确我党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基本论点;其次是关于党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以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各个战线上

的重大方针政策,使他们认识到“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优越性;还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全党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特别是中苏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加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重要性;最后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会议还要求必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追求名利、贪图享乐、自私自利、自由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⑩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加强留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打造国际“反修防修”的前沿阵地,中央决定在1960年暑期把部分留苏学生调回国内,集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当年暑假,共计1205名留苏学生集中回国进行了政治学习。期间对国际问题学习了十天,听取了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学习了安子文同志的报告和杨秀峰部长的讲话,研读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人民日报》的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前进》等有关文件,组织了关于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以及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等五个问题的讨论。当时的总结报告中提到“经过学习,暴露出的问题说明留学生较普遍地缺乏阶级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尤其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在国际问题上划不清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时代主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现代修正主义危害等问题上有比较严重的思想混乱和认识误区。”^⑪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又将留苏学生集中回国教育时间从两年一次变为一年一次。集中性的政治学习之后,又作出了“部分留学生不再继续出国学习,每个系组织一名代表回苏联完成剩下的学业,并负责带回所有同学的私人物品”的决定。对于不能继续出国的留学生,当时的主要判断标准是政治表现不好。

(四) 加强保密教育和纪律要求

会议还要求留学生加强保密意识,严格规定了几项禁令:第一,留学生不得直接向国内任何部门索取任何科学技术资料,必要时须报使馆审查批准,并由使馆按照保密手续办理;第二,留学生不得接受所在国学校或导师的委托,向国内索取

科学技术资料,如对方有此要求,须经过外交途径向我使馆申请;第三,国内任何部门不得向国外留学生寄送任何有关科学技术资料;第四,留学生不得接受国内任何部门的委托,搜集所在国科学技术的情报资料;第五,除《人民日报》已公布的科学技术情报,不得擅自向所在国介绍国内科学技术的新成就。^⑫

第二次全国留学生会议的召开,为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派遣留苏学生工作奠定了新的指导思想 and 政策方针。从此之后,自50年代开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留苏教育势头戛然而止,留苏教育印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烙印,深受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

三、中苏双方围绕留学教育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显现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方也从多个方面限制、阻挠新中国留苏教育的正常开展。中苏双方围绕留学教育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 苏方逐步限制甚至拒绝接收中国国防机密专业留学生

1958年以前,苏联方面在接收中国机密专业留学生方面是比较开放的。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派遣航空、舰艇、坦克、火炮、炮弹和炸药等军工专业留学生赴苏学习。1956年,从当时的留苏大学生中抽调196人学习原子能有关专业,同年苏方接受10名中国留苏学生到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学习“可操纵火箭”和“不可操纵火箭”。1957年,根据两国国防新技术协议,新中国又从留苏大学生中抽调77名留学生学习导弹专业。1958年,两国虽未商定接收新中国学习国防机密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但是有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到校后,在学校的协助下可以在国防机密专业求学。在1958年苏方原则上接受中国派遣机密专业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计划后,由于当时中国方面没有作好准备,一直延迟到1959年3月中方才提出派遣175人到苏联学习国防机密专业。

但随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态度也发生急剧变化。苏方先是表示对于接收国防机密专业的中国留学生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随后表示只能接受中方计划派遣中的110人,到1959年12月最后正式答复时却表示只能接受其中65人的

申请(最后中方实际派出63人),没有被接受学生的专业主要是原子能、导弹和火箭专业,即使是被接受的留学生,也有人未能如愿到国防机密专业学习。

针对这种情况,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国内可以培养的一般专业可以少派或不派,鉴于苏方接受中方机密专业学生的现状,可以考虑派遣专业相近、有发展前途,而且苏方可以接受的专业。特别是那些对中方来讲属于高精尖的稀缺专业、同时对苏方来讲并不算机密专业的,争取多派留学生。

(二) 苏方逐步限制和刁难中国留学生的日常学习和实习

苏联一些院校在专业细化时有意把中国留学生从较好的专业排斥出来。如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30名中国大学生,原定学习的专业中有“同位素”和“自动控制”,专业细分后改为“同位素提取”、“同位素应用”和“反应堆控制和加速器控制”、“铀生产控制”。苏方为了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学习,不征求中国学生意见,由校方直接指定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导致原先在“同位素”专业学习的四名留学生全部转入“同位素应用”专业,原先在“自动控制”专业学习的两名学生全部被分配到“反应堆控制和加速器控制”专业,而这两个专业都相对不太重要。当留学生提出要求更换专业时,遭到了学校的拒绝。同时,苏方还限制中国留学生参加科研活动。莫斯科门氏化工学院对中国留学生不提供实验仪器和原料,不共享资料和数据,教师也不给予指导,学生完全靠自学,科研成绩可想而知。

苏方还试图控制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资料和毕业论文。他们力图缩小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范围,不提供撰写毕业论文必需的资料和数据,对在机密专业学习的研究生也不提供保密材料;同时也不允许中国留学生接触较好的实验,不提供较好的仪器设备,导师不作具体指导,以缩小留学生接触的科研范围,使他们学不到真正前沿实用的理论技术。这种情况在1960年下半年愈演愈烈,中方留学生被排斥范围越来越大。1962年夏天后,苏联一些高校(如包曼高等学院、莫斯科门氏化工学院等)还通过对图书资料进行清理的办法,逐步缩小中国留学生的阅读范围,导致中国留学

生在保密图书馆基本上借不到所需要的资料。苏方只允许中方留学生查阅苏联公开出版的文献,一些高校甚至连一般图书馆的目录也拒绝中国留学生的查阅。1962年下半年以后,苏方普遍不让中方留学生参加专业会议和机密专业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甚至修改中国留学生的论文题目为公开题目。而在1959年底之前,学机密专业留学生的笔记,虽然不能全部带回,但是有少数可以通过使馆转给国内,但当时也被以各种理由拦截下来,不准带出。^⑬

苏方对学习国防机密专业的留学生的毕业实习也百般阻挠,不进行相关实习安排。1960年,苏方学校以无法安排中方学机密专业的留学生在苏联工厂实习为借口,有学校要求留学生回国实习,有学校把留学生安排到与所学专业相关性不大的厂矿实习。因为涉及国内机密资料的保密问题,当时驻苏使馆针对这种情况建议,留学生毕业论文原则上要研究所在国的问题,不做国内具体问题的题目;如对方不同意,则以国内需要为理由,调回国内。今后对于学习国防机密的五年级留学生,于暑假回国学习后,凡是苏方不能适当安排实习的即在国内分配工作,不再出国。^⑭

(三) 中苏双方围绕留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展开激烈交锋

1962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代办,指责中国留学生反对苏共,窃取苏联机密。他们声称,一些中国留学生公开发表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共二十二大决议的言论:格沃洛夫炮兵无线电学院的中国军事留学生高衡瑞中尉,在苏共党史课上攻击苏共,质疑苏共政策的正确性。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中国军事留学生蔡嗣宗和陈新海,在学校传达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会上,公开指责苏共违反了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在传达苏共二十二大精神的场合,以退场或者不妥当方式表示抗议。同时,苏方还指责一些中国留学生破坏在保密企业进行生产实习的规定和制度,窃取苏方机密,并表示苏方有关部门将不得不开除那些攻击苏共和苏联、违反苏联法令的中国公民。^⑮

针对这样的指责,中方表示了强烈抗议。同时考虑到今后这样的摩擦会越来越多,中国驻苏使馆也刻意加强了留学生的保密和纪律要求。当

时留学生管理处认为,虽然留学生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留学生可以接触到广大的苏联中下层群众,因此留学生在对外活动和与外国人个别接触中,应该秉持团结友好的态度,注意利用合法条件,积极、正确、适当地正面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中方对国际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在对外接触中,留学生不主动挑起争论,但也不怕争论,对于怀疑和误解中国共产党的人,要以个人名义,严格按照党的观点进行必要的说明,解释要有耐心,充分说理,即便一时解释不通,也要对他们保持友好态度。对恶意挑衅的人,要据理驳斥,坚决顶回,但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要指名道姓,不要被对方抓住“辫子”。1962年底,教育部为留学生对外工作规定了几项原则: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63年底,驻苏使馆针对当时的新情况对中国留学生政治课提出新的要求,即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采取说理态度,争取群众的同情;掌握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适可而止;认真研究对方的论点,作好充分准备。^⑯

这一时期,留学生也自觉扮演着“反修防修战士”的角色。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宣布大使馆工作人员梅文岗和留苏研究生刘道玉(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等五人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召回,原因就是他们在苏联散发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国外交部在发表声明之后,于6月30日将刘道玉等五人召回。另据材料反映,敖城音乐学院的张昆平、丁逢辰、朱丽三位留学生不仅在校内与修正主义作坚决斗争,有时还主动参加校外的群众集会,利用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列城音乐学院学习圆号的陈明根,在回课时吹过一个音,他的伴奏教师伊万诺夫随即说“你的表现就像你们国家越过中印边界一样”,陈明根马上对他提出一系列质问和批驳,弄得他无言答对。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郑小瑛和韩里因为散发复信,遭到校方的抗议。列宾美术学院研究生王克庆的导师阿尼库申,在王克庆的工作室发现《分歧从何而来》等两本反修小册子,硬说书中攻击了赫鲁晓夫,是“坏书”。王克庆批驳了他的说法,并让他好好看这些书,争论持续了三个

多小时。^①

对于留学生个人,教育部规定,所有留学生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周围动态(包括苏联中下层民众对留学生的态度有无反常、学习条件有无变化、有无新的措施、周围有无监视或其他可疑现象等),有问题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注意安全,外出尽量两人以上同行,晚上尽量不外出;注意保密纪律。电话中绝不能谈论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开会地点慎重选择,并要经常更换,反映材料不能在宿舍书写,留学生自我清理相关个人资料,涉及机密的要销毁,不能私人保存;日常和国内通信绝对禁止谈论政治问题;禁止小广播,自己知道的事情不外传。^②1963年4月到5月,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对正在苏联学习的342名中国留学生进行了一次组织整顿,整顿的重点是审查留学生在国际阶级斗争中的立场、观点和政治思想表现。

(四) 中苏围绕争夺留学生的斗争愈演愈烈

苏联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蛊惑、策反留学生留居苏联,其中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留学生所在学校、教师对留学生施加影响,甚至还会利用中国留学生的异国婚恋。苏联卫生部芳香药用植物研究所的留学研究生刘永隆就受到导师几次挽留,导师甚至以帮助其解决苏联国籍和配偶、子女的工作、求学问题为诱饵,建议其留居苏联。^③

这一时期的异国婚恋问题也深深印刻上了政治烙印。当时,留学生的跨国婚恋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被上升到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待。1959年以前,驻苏使馆对留学生异国婚恋问题秉持的原则是,一般留学生与苏联公民恋爱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以免影响将来工作,说服无效可同意结婚;对于国防机密专业以及外贸专业留学生,禁止与外籍公民结婚,如果劝阻无效坚持结婚,则不再从事机密或外交专业工作。^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明确规定留学生在学期间不论同外国人或中国人都不得结婚。对留学生和外国人恋爱,不要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但要加强教育,号召留学生不要和外国人进行恋爱,如确已经发生恋爱,则坚决调回国内。^⑤

1961年7月,中共留苏学生委员会在向中共

中央组织部、外交部、教育部提交的报告中提到,“事实证明,凡与苏联姑娘恋爱和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都表现政治上消沉,业务学习不努力,生活作风逐渐腐化;其中凡要求留在苏联和逃跑不愿回国者,都与男女关系有关,因为他们一与苏联姑娘发生关系,就造成留在苏联的条件,就有走上叛党叛国的危险。……究其原因,一是国外环境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二是本人思想一贯表现不好,在新的环境下经不起考验,旧病复发。”^⑥1964年3月,中央批准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中提到,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留学生在海外学习期间不准恋爱结婚。^⑦因此,到了60年代中期,中国留学生的跨国婚姻现象实际上已经终止。

四、新中国留苏教育的延续和终结

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上半年,随着“九评”的公开发表,中苏分歧愈演愈烈,矛盾和斗争也逐步扩大。蒙古和东欧等国也紧跟苏联步伐,加紧对中国留学蒙古和东欧国家学生的围攻。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3月30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来信进行了公开答复,随后中国留苏学生也在各种场合,利用合法渠道宣传中方的主张。据材料反映,中国留学生和苏联校方主要围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敌人是谁)”、“中苏经济合作与中苏关系”、“南斯拉夫问题”、“中苏分歧是原则问题还是策略问题”、“中国留学生散发文件材料是否合适”等问题开展交涉。^⑧1963年9月,又发生了苏联边防军武装扣押国际列车,驱逐中国留苏学生及工作人员的事件,中方称为“纳乌什基车站事件”。^⑨9月16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了62名被驱逐的留学生,指出这是新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下的新动向,对留学生的坚决斗争表示了慰问,要求留学生不背包袱、戒骄戒躁。^⑩随后经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亲自批示,这些留学生中的20多人再次出国,并于10月初抵达莫斯科。1965年3月,中国留苏学生在征得使馆同意的情况下,参加了支援越南留学生反对美国轰炸越南暴行的示威游行,在美国驻苏使馆外和苏联军警发生冲突,造成3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受

伤和被捕。^②

针对新的斗争形势,1964年3月,经中央批准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往国外留学生管理教育工作的暂行规定(草案)》中明确规定,留学生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忠于祖国。对国外留学生管理的要求是把留学生工作当作涉外工作高度重视,在国外要以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对留学生进行管理。具体而言,对留学生要加强几个方面的教育: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教育;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教育;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修养和革命气节的教育;关于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和保卫保密的教育。对于留学生而言,这一时期组织纪律性要求也更加具体和细致。当时明确规定:留学生不准向外国人借钱,不准接受贵重礼物,不准和外国人发生不正当的经济往来;不准在外住宿,不准去不正当的娱乐场所;留学生科研成果不得送往其他国家发表;对所在国邀请的访谈、约稿等活动应婉言谢绝;不准恋爱结婚。与此同时,新的《留学生守则》也下发,十条规定中前几条都是政治思想要求,如“忠于祖国,听党的话;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遵守组织纪律,加强请示报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严守国家机密”^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部、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停止了留苏学生的选拔派遣工作。通知规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所有留学生都要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9月19日,中国高等教育部送交各国驻华使馆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已全部停课,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明年暑期和今年年底毕业的留学生可以提前毕业”^④。20日,高教部进一步通知苏联大使馆,“苏联在华留学生原计划今年年底毕业,基本课程已经学完,可以提前毕业”^⑤。对于尚在国外的留学的学生,采用休学和提前毕业的办法,务必于1967年2月之前返回祖国。

接到通知后,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并没有就中国提出的毕业时间问题作出回答,而是在10月7日单方面召回了自己的留学生,并且限

令中国留苏学生在10月离开苏联。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22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拉兹杜霍夫,交给他一份照会,表示“强烈抗议苏联政府无理赶走我全部留学生”。中方认为,“苏联政府这次悍然破坏中苏文化合作协定并不是孤立事件。最近以来苏联领导精心策划新的世界规模的反华运动,苏联报刊恶毒诬蔑和攻击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诽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国关系的步骤。所有这些,再次暴露了苏方高唱什么反帝‘联合行动’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同美帝‘联合行动’反华倒是货真价实。”^⑥但拉兹杜霍夫拒绝了照会。如此一来,中苏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10月23日,红卫兵在苏联大使馆外举行示威游行,一连续了几天。27日,苏联提出照会,抗议红卫兵的行为,“红卫兵封锁大使馆的入口,威胁苏联外交官,沉迷于‘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辱骂、猥亵动作和姿势,以及恶意刁难’”^⑦。

11月1日,中国答复驳斥苏联的抗议,认为它是“荒唐的和毫无道理的”,并称苏联“与美帝勾结,加紧恶化中苏关系,毫无道理地从苏联驱逐出所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国革命青年来说,自发地聚集起来同反修街附近的苏联大使馆做斗争和贴标语,抗议毫无理由地驱逐中国留学生,这是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⑧。就在双方照会、抗议的同时,为了表示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者”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不满,即将归国的留苏学生决定于10月26日向位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他们在25日已经同列宁陵墓管理处约定,于26日上午11点前去敬献花圈,并同时将此事通知了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但是,26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当中国留学生整齐列队,抬着花圈来到红场入口处,却发现苏联当局竟出动警察封锁红场百般刁难。红场所有的入口都被封锁了。留学生抱着消除误会的态度,派代表向苏联警察说明来意,得到的答复却是拒绝。学生代表一再解释,也没有什么进展。留学生感到这是苏方的故意刁难。一番斗争下来,直到下午2点整,苏方才允许全体学生乘一辆大轿车进入红场,但不许列队步行进去,还用一辆警车在前“引

路”。学生们也作了让步,乘大轿车到达列宁陵墓。留学生得到通知,花圈不能放置在列宁陵墓前和斯大林墓上,只允许放在列宁陵墓左侧的观礼台前,更不许去瞻仰列宁遗容和斯大林墓。

红场献花当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为即将离开的学生们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会上不断出现“反帝必须反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等革命口号。会后留学生还一起观看了纪录影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1966年10月27日,在莫斯科的41名学生乘火车离开。另外24名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学习的留学生在列车途经该市时一起乘车离开苏联,返回祖国。出发当日,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参赞安致远和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华侨代表共100多人前往车站为学生送行。每一位即将离开的学生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纪念章和光荣花,同前来送行的人们一起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国际歌》。

回到祖国后的学生也受到相当的重视。11月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代表毛泽东主席看望65名学生。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和15000名红卫兵,在工人体育馆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随着被苏联政府强行驱逐回国的65名留苏学生乘坐“东风”号国际列车返回北京,新中国的留苏工作也画上了句号。

五、结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教育,吹响了新中国科技强国的号角。大量优秀留学人才的选派和回国,为新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讲到,“向苏联学习,不仅要学马恩列斯理论,还要学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建设我们国家。”^④新中国的留苏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向“老大哥”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能,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一大批栋梁之材。

不可否认的是,中苏关系的恶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严重地影响了留苏教育的正常进行。60年代的留学生从中苏友谊的“使者”转而成为反修防修的“战士”,身份的变化使得留学

生在国外的处境一度比较紧张。留学生订阅的《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被苏联海关全部没收。留学生的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有些研究生的学习受到刁难,行动受到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

从中国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留苏预备生的政治审查工作日益严格。1963年,教育部在《选拔留学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为了适应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和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提高派出留学生质量的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今年选拔留学生工作中,必须切实保证和提高派出人员的质量。除本人的政治历史、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认真审查之外,特别注重留学人员的思想情况,着重审查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五反运动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的政治思想表现。对他们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作风,也注意进行严格的审查。基层选拔单位所提审查意见,要求尽量详实,必要时得补充专门材料。”^⑤选拔留学生过度强调政治条件和思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一部分真正的优秀青年留学国外的机会。中苏关系破裂后,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部分留苏学生长期被闲置,甚至遭到不公的待遇,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注释:

①《关于派遣留苏学生的意见》,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58—C—357.001。

②《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委〈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③⑦⑩⑫⑭《中央批转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生工作的意见〉》,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0—Y—26.0001。

④⑬《关于艺术类留学生情况的汇报》,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58.0005。

⑤⑨⑲⑳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第223—224页,第251页,第248—253页。

⑥这个数字可能有分歧,但是总的趋势是数量的急剧减少。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129页;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旧史新论

⑧《函送“1961年派遣留苏研究生、进修教师、大学生计划”》，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1—C—312.0002。

⑩《一九六零年暑期留学毕业生政治学习总结报告》，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0—C—56.0006。

⑬《使馆留管处汇报情况：苏方对我学机密专业学生限制刁难的若干情况》，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67.0004。

⑭《中苏双方互派留学生的情况和问题》，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55.0010。

⑮《苏方就我留学生“反对苏共”“盗窃苏联国家机密”提出口头声明的谈话记录》，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2—C—272.0001。

⑯《驻苏使馆贯彻执行外交部、教育部关于留学生对外活动的指示的情况报告》，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69.0018。

⑰《留学生保密、保卫和回国注意事项》，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66.0003。

⑱《苏方要我留学生留居苏联材料》，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2—C—271.0005。

⑳《留苏学生与外国公民结婚事》，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58—C—358.0004。

㉑《关于留苏学生同外国人的男女关系问题的报告》，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1—C—214.0002。

㉒《在反修斗争中我留学生与学校当局斗争的情况》，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403.0001。

㉓1963年9月5日，6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若干使馆管理人员离京赴苏学习，7日到达苏联纳乌什基车站，遭到苏联边防军警的扣押和驱逐。

㉔《留学生关于纳乌什基车站斗争问题讨论小结》，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370.0020。

㉕游览《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见证者——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

㉖程裕祯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㉗《给各国驻华使馆的备忘录》，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96—C—205.0002。

㉘孔寒冰《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中苏关系》，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2期。

㉙⑬[英]彼得·琼斯等《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第138页。

㉚《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8页。

㉛《1963年选拔留苏预备生注意事项》，参见教育部档案，档案编号：98—1963—C—210.0003。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文慈]

讣告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汤润千同志于2016年3月14日因病辞世，享年89岁。汤润千同志1927年6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中国共产党党员，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担任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河北师范学院副院长、河北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务。1993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三等奖。他长期在高等院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苏联问题研究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国内“第一国际史”研究领域著名专家之一，曾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顾问，是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著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简明教程》（第一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译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4—1866）》、《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6—1868）》等文献。